

莫言小说的诗性叙事与当代诗化小说

郝丽姣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摘要:古今中外学界对“诗性”概念的界定有所不同,由诗性范畴衍生出的“现代诗性”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考察莫言小说的诗性叙事。莫言小说在人物塑造、意境营造、古典叙事、现代手法等方面充分展现了“现代诗性”的内涵。诗化小说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一个重要谱系,莫言的诗化小说赓续诗化小说脉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将抒情性与叙事性并置,民间性和崇高性结合,中国古典美学意识与现代批判意识结合,形成了一种崇高与荒诞间或混杂的独特的诗性品格。通过考察莫言小说的诗性叙事与当代诗化小说的关系,进而发现莫言小说以驳杂混沌的诗学面貌,丰富和重构了“诗性”的内涵,为当代诗化小说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关键词:诗性;莫言;诗化小说;古典叙事;现代手法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92(2021)06-0086-08

“诗性”作为一个美学范畴的概念,通常是美好、优美的代名词,给人以审美感受和审美趣味。近年来,对于莫言叙事话语的研究多从“历史叙事”“民间叙事”等入手,而“诗性叙事”似乎与莫言小说叙事方式相去甚远。并且,莫言的创作始终坚持着颠覆和解构,对于正统权威范式的亵渎以及对于现实主义叙事成规的拆解,使其作品被视为亵渎神圣、贬损崇高的典范文本。加之莫言超群的叙述能力以及狂放的想象力,尽写污秽物或人性丑态,作品被打上了“审丑”的标签,仿佛不仅与诗性无关,还在一定程度上对“诗性”构成了消解和解构作用。那么“诗性”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莫言小说是否真的远离“诗性”?如果没有的话,那莫言的诗性叙事是如何展开的,又如何在中国现当代诗化小说的谱系中来定位莫言的诗化小说?本文在梳理中国现当代诗化小说的基础上,来考察莫言小说的诗性叙事与当代诗化小说之间的关系。

一、诗性的具体内涵

“诗性”这一概念十分模糊,与“诗意”“诗化”“诗思”等概念经常会混在一起使用,因此首先界明本文“诗性”的概念十分重要。

首先,考察近现代西方研究中的“诗性”内涵,西方对于“诗性”概念的提出,最早的肯定是维柯,维柯的《新科学》当中的“诗性智慧”为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概念,他用“诗性智慧”,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1]181},来表示原始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凭借“强旺的感觉力”“生动的想象力”^{[1]182}来进行创造,毫无“抽象、洗练或精神化的痕迹”^{[1]184},单纯地沉浸在感觉当中。这种“诗性逻辑”更多是强调“感觉”“想象”的色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早期原始人的这种“诗性智慧”指的就是人的想象和创造,因此,“所谓诗性,一定是确立在‘人’的意义上的,是人在与外部世界之间发生关系时对‘自我’的一种特殊发现和验证,是人以其独有的想象和创造对世界和自我的一种重构和重建,并由此成为一种包含了人的全部本质性的特殊审美范畴”^[2]。

“诗化”以及“诗性”之间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于,“诗性”并非某种具体的艺术手段,也并非某种特殊的艺术表现,而是艺术作品自身所包含的审美内涵,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内在品格。而“诗化”明显指的是某种艺术手法,一种在叙述方式中融汇了诗意方式,从而来呈现艺术的内在品格和诗人的精神世界的艺术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海德格尔曾经提到的“诗意”与这一概念接近,海德格尔曾经提到

艺术究其本质都是诗,这里所指的“诗”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文学体裁,在这里作形容词,指的是一切艺术都具有某种“原初本性”^{[3]74}。

海德格尔把“诗性之思”看成是对美的境界体验的一种方法,海德格尔的诗性更加形象化和诗性化,这种思维没有了理性认识和逻辑思维,也不再强调科学的认识,理性的思考,成为理性逻辑的对立含义。“诗性思维是一种超功利的直观思维,也是一种非理性思维”^[4],海德格尔的“诗思”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思维方式。与“诗性”相比,更加形而上,诗思用直观来显示,那诗性则用内在品格呈现。

由此可以看出,西方学界对于“诗性”的阐释,主要集中在“诗性”在于艺术本身所呈现的内在品格,在于艺术家调动感觉和想象所创造出的“原初本性”。

其次,中国古典美学中也有许多关于“诗性”内涵的阐释,与西方的阐释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于,在中国古典文论对于“诗性”这一概念的阐释,更多在于意境的营造。“中国人的思维从一开始就具有将概念的理性思维和整体直观的顿悟体验相融合的特征”^[5],在我国的魏晋时期,就有过对于“言意之辨”理论的探讨,这种理性思维和顿悟的融合在我国禅宗得到了某种呈现,皎然的《诗式》在论诗歌的意境营造时,就已经流露出了诗境与禅境的融合,他这种诗歌美学方式的追求,主要是强调境中含情,情由境发,体现出一种禅家寂静空灵的内心世界,通过某种暗示,言此即彼的方式从而显露出“顿悟”的精神状态,这种禅宗主要侧重于对于事物的非理性的思考。

中国古典美学中与“诗性”的含义大体相当的是“诗意”。“诗意”顾名思义指的就是诗的意境,给人以审美感受和审美趣味,这一点在中国古典诗词中展现得淋漓尽致,古典诗词运用典型意象,营造出来的不同的诗歌艺术境界,如李白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为我们营造了送别的离别之愁,再如李之仪的“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为我们营造了相思之苦的意境。这种“诗意”的营造,往往是超脱现实的诗人内心主观投射,具有非现实、想象化的特征,追求的是“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的境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诗意。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对于“诗性”的阐释,无论

是皎然的“但见情性,不睹文字”,还是司空图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再到袁枚的“性灵说”,后到王士禛的那种“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都可以显现出“诗意”营造所具有的几个特点。首先就是,不着痕迹,无迹可寻;其次,强调具有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尽的境界;最后,突出艺术作品本身的内在品格和审美特性,而并非外在的艺术技巧和表现形式,从而进行高度艺术化、形象化的心灵投射。

最后,考察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诗性”内涵,需要我们可以从当代诗化小说的代表孙犁、汪曾祺、贾平凹等来寻找,孙犁以“纤丽的笔触和细腻的情调”风格,不强调那个年代典型革命政治环境以及典型革命人物的刻画,而是更加注重抒情化、散文文化,孙犁的诗化小说接近于散文,更加强调艺术性、审美性,而不是技术性和故事性,他重视艺术表现而并非故事情节地开展。再如汪曾祺,师从沈从文,汪曾祺作品总是蕴含着中国传统“文人”的情调,他的这种“汪味”为小说创作增添很多诗意,如《受戒》《大淦记事》,当中对于民间生活的描绘,大大增加了小说本身故事性所不具有的审美性和表现力。40年代,废名、沈从文、周作人等都批评了“戏剧化小说”,强调写作“自自然然的”“散文化的小说”,汪曾祺也发表了类似的主张。

周作人曾经提出了“抒情诗的小说”的概念,来表达“小说不仅是叙事写景,还可以是抒情”,钱理群也提到了“诗的小说”的概念。“诗化小说”概念的提出,大致体现在“语言的诗化与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与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6]。吴晓东主要是从比较诗学的角度出发,来探索“诗化小说”的缘起及发展。张文东主要是从“诗性批评”的角度出发,来解读“诗性”文学的价值以及呼吁回归诗性本质,重构被这个时代所结构太多的“心灵与精神”^[2]。“诗化小说”的研究立足于文本细读,提升到诗学范畴,是一种“文化诗学的研究,对现代抒情小说的复调的诗学、回忆的诗学、牧歌等范畴的挖掘”^[7]。

从当代诗化小说的代表作家作品以及理论批评家的论述当中,我们可以明确“诗性”的内涵在当代诗化小说中不仅具有语言、意象、节奏、抒情等外在的诗化特征,具备审美性、艺术性和创造性的表

现特点,更重要的是表现出对人生、对社会、对时代诗意的某种超越性的追求。

综上所述,“诗性”自身所含有的艺术性、审美性、想象性和创造性是西方和中国古典阐释的共性,无论是西方对于“诗性”的阐释,还是中国古典对于“诗意”的解释,都可以归纳出两者的交集在于艺术性、审美性、想象性和创造性。本文所使用的“诗性”是“现代诗性”的内涵,不单是具有修辞、意象、语言等外在的诗化特征,不仅是为了营造“诗意”,更多的是突出内在的特征和精神品质,不断进行某种精神的追求和生命的探寻。

二、莫言诗性叙事的展现方式

1. 莫言小说的诗性特质通过人物形象彰显

人物形象所具有的诗性气质,对于小说诗意的呈现起着很大的作用。《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那瘦小黝黑,稚气笨拙,沉默寡言的黑孩,本是时代的牺牲品,但莫言将他与透明的红萝卜这一意象结合起来,使这一单薄的人物形象在红萝卜那金色的光芒中焕发出诗性的光芒。莫言选取黑孩这一人物形象颇具匠心,这一人物形象在那个激进的时代,似乎显得格格不入,孱弱的身体倒是能与劳动疲累的时代相融,黑孩的不安与焦灼正是那个时代的焦灼,黑暗的现实世界与透明的红萝卜那个梦幻世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莫言打开了黑孩被关闭的感官,让他尽情地去感受时代的疼痛和梦幻世界的美好。黑孩毋庸置疑是展现这两个世界最好的想象,陷在黑暗世界无法自拔,又苦苦扒向那个金色的梦幻世界,这一人物形象成为莫言颠倒历史叙述,重建70年代真实叙述的载体,无疑焕发着诗性的光彩。

莫言作品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可谓是独特的存在,如《红高粱》里那个热情奔放、泼辣大胆的戴凤莲,她对爱情的义无反顾和执着追求,以及大胆英勇,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即使在弥留之际,也表现出生命力的强悍。这一性格丰满的人物形象,加之红高粱的恢弘壮丽,凝聚成浓浓的诗性,弱化了战争的残酷和暴力,突出了乡村赤裸裸的底色,为我们展现出了民间生活的“悲壮而高洁、强悍又不屈的精神”^[8]。《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她是生育的工具,靠“借种”生下九一个孩子,却没有一个是自

己丈夫的亲生骨肉,在风雨飘摇的几十年的历史变迁当中,她自身所包含的原始母性的创造力,使她成为了“生殖女神”的化身^[9]。上官鲁氏之所以可以孕育这么多孩子,并且在时代的变迁当中,成为一个家族的主心骨,无疑是因为莫言赋予了这一女性人物形象以“神性”的光芒,莫言颠覆了传统女性人物形象,使其不再有传统社会所强加的贞洁保守。上官鲁氏的一生备受磨难,生命力却极其顽强,在几十年的风雨飘摇中,她不断地找寻“女性失落的历史和自我”^[10],她身上的“母性”的光辉凝结成浓郁的诗意,使得整部小说都在母性的光芒中,诗意的韵味里,进而细细诉说烙在人心灵上最深的历史记忆。《檀香刑》当中的风流娇美的“狗肉西施”孙媚娘,不甘心与心智不健全的小甲的婚姻,选择与钱丁、县太爷的畸形爱恋,最后为救亲爹孙丙四处游走,最终杀死赵甲。孙媚娘这一人物形象贯穿小说始终,从众多男性人物形象当中依旧让人印象深刻,她自身对于命运的不屈服,追求爱恋的大胆执着,最后救父的英勇侠胆,与小说当中的茂腔凝聚,将结尾一曲高昂悲壮的茂腔升华,使小说充满浓郁的诗意,这一人物形象的“诗性”描写,为整部小说增添了许多魔幻的光彩。

莫言作品中的残缺人物形象展现着“诗性”叙事,如《丰乳肥臀》里的有着“恋乳癖”里的上官金童,《檀香刑》中的赵小甲,莫言对于这些身体不健全人物形象的刻画的主要目的,是因为通过这些人物身体的残缺,进而展示生命的某种残缺,以这种独特的视角,为我们展现生命的残缺状态、时代的别样色彩,这些人物形象也在莫言的笔下,透露出来浓浓的诗意。

2. 莫言“诗性”叙事离不开他对意境的营造

在莫言的作品当中,高密东北乡始终是其小说的背景色,成为他永远也离不开精神故乡,在故乡的依托之下,加之不加节制的语言狂流,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生命力的世界。莫言在《透明的红萝卜》当中所做的尝试就是“意象的营造”,因此,在这篇中篇小说当中,“透明的红萝卜”始终都带有神秘色彩和虚幻色彩,在对那个晶莹剔透的萝卜的描写当中,整个空气都弥漫着神秘魔幻的气息。莫言对于黑孩这一人物形象的处理,也正如李陀所说的,“不仅不像个现实中的真实人物,反而像个神秘的

小精灵”^{[11]17}。与此同时,色彩的运用也极为突出,如“一绺蓝色火苗和一绺黄色火苗在煤结上跳跃着”^{[12]29},他对色彩的运用仿佛信手拈来,十分形象生动,活泼有趣,形象传神,通过出色的色彩感觉和运用以及环境的描写,使得整部作品更加具有了朦胧的诗意、静默的神秘。

莫言的每一部作品总会让人联想到一幅图景,如那片被戴凤莲和乡民的鲜血染红的红高粱,那个民间英雄余占鳌的英勇热血洒遍的红高粱,“我奶奶”临死之前躺在那片高粱地里,她注视着高粱地,“在她蒙眬的眼睛里,高粱们奇谲瑰丽,奇形怪状”^{[13]57},莫言用他所钟爱的红色为我们营造了一幅壮丽的场面,使得余占鳌这个草莽英雄的英勇,戴凤莲这个泼辣女子的热情奔放,抗战杀敌的紧张急迫都在那片红高粱地里诗意地呈现出来。再者,在《檀香刑》当中,莫言将凌迟、腰斩、砍头、“阎王栓”“檀香刑”这五大酷刑演绎得精妙绝伦,行刑过程犹如艺术杰作般精致细腻。钱雄飞被凌迟的画面色彩绚烂,他鲜红的血液在胸脯处“串珠般地跳出来”,“然后部分血珠溅落在地,部分沿着刀口的边缘下流,濡红了肌肉最发达的钱胸”^{[14]186}。这种凌迟场面的唯美描绘使得血腥残暴的酷刑仿佛成为一场精彩绝伦的艺术飨宴,加之茂腔的千回百转,变幻无穷,极富画面感和动态感。莫言的这种特殊的“诗性”叙事方式,刻意拉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与时代的距离,将“生命哲学”进行了一次升华,充满诗意,美感的升华,将民间精神进行了大肆张扬,这种在意境营造中所刻意采用的“诗性”叙事,更重要的是“对此前作为一切社会科学之基础的伦理学视域的超越”^{[11]55},从而完成了对于人的生命以及精神的内在深度方面的追问和探寻。

3. 莫言特别善于运用传统民间资源,在叙事上向古典靠拢,来谱写全新的乐章

莫言在叙述中或杂有戏文,或间有唱词,或是“旧瓶装新酒”,套在了传统叙事的壳子上,来谱写全新的文章。《生死疲劳》不仅有中国古典章回体小说的篇章结构,同时还吸取了民间叙事的特点,小说采用了“六道轮回”这一种民间想象,并且将其隐藏在小说创作的叙事线索当中,使得整部作品带有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这部作品特殊的结构,

使其具备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情节曲折迂回,描写上诗意细腻的特点。《檀香刑》讲述的就是中国传统历史上一种酷刑,莫言选择这一题材来作为探索国人历史与现实的切入点,无疑不是一个巨大的创新,其中杂糅的茂腔和韵文,与整部小说人物的感情起伏和小说故事情节地开展紧密结合在一起,这种韵文的或悲愤慷慨,或柔情缠绵,或戏谑调侃的多种特点与整部作品紧密贴合,从而给人缠绵多情的诗意体验。《天堂蒜薹之歌》是紧跟现实生活的急就篇,但是并不同于报导纪实作品的刻板,正如他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小说家总是想远离政治,小说却自己逼近了政治”^{[15]277}。莫言沿袭了一贯的民间精神,却又不断逼近政治。每一章节开头天堂县的盲人歌手张扣演唱的民谣构成了“天堂县民谣”,这种借鉴章回小说的技巧,使得“即将发生的行为(预期的叙述)的意义和刚刚结束的行动(事后的叙述)的意义都更加明确”^{[11]75},这种传统的叙述技巧使得整部作品都沉浸在循环往复的唱词当中,进而推动了情节发展,这种形式的创新使得小说展现出了深深的莫言充分利用民间资源,实现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从而展现新的魅力。这种努力使得莫言的作品兼具中西方叙事特色,西方现代叙事方式使得小说更加符合现代读者阅读的口味,而中国传统古典的技巧为这种融合注入了浓郁的诗意,在作家无意识逼近政治的时刻,民间资源是莫言进行文学创作的宝库,他对这一资源的吸收和利用,使得自己的风格得以保持。这种写作形式使得读者沉浸在政治背景中,却体味其中浓郁的民间意味以及缠绵浓郁的诗意。

4. 莫言运用感觉化描写、扭曲变形、意识流等现代手法,来重新定义“诗性”这一概念

莫言始终“立足个体感性生命,将崇高美学、怪诞美学、暴力美学等杂糅其间,在诸种美学元素的交错和混沌中,形成其独特的现代诗性品格”^[16]。在《酒国》当中,莫言那种语言游戏和叙事狂流,将当代中国的黑暗和混沌缠绕其中,残暴、野蛮、血腥,丑恶与热烈、浪漫、交织在一起,苦难和欢乐、痛苦与享受混为一团,从而为我们提供了精彩纷呈的“吃人盛宴”,小说主人公丁钩儿在欲望的过度放纵中,也最终被欲望所吞噬,“酒”带给人醉的感受,将人从现实带进幻觉、反常,莫言借助“酒”,运用感觉

化描写,让人物和读者穿梭在这种现实与幻觉当中,怪诞与狂欢交织,堕落与挣扎缠绕,其中渗透着悲悯的诗性特征。小说中不单有过度放纵的性欲场景,还有大胆残暴的吃人描写,杂糅莫言“颓废”的语言,进而使我们沉浸在他所为我们创造的魔幻世界当中,产生了“一种纠缠挣扎于丑恶、污秽、死亡和苦难却又超拔其上的诗性——残酷情境中绽放的唯美梦幻的诗性”^[16]。

莫言的作品充斥着大量的感觉化描写,正如洪子诚所说的:“莫言的小说,表现了开放自己感觉的那种感性化风格……有大量的感官意象奔涌而来……”^{[17]289}。莫言也曾说到:“也有人说,莫言是一个没有思想只有感觉的作家……一部小说就是应该从感觉出发。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要把他所有的感觉都调动起来”^[18]。莫言在《酒国》中,也大胆使用了感觉化描写,如“我的岳母”再讲授红烧婴儿的烹调方法时,“我感到仿佛有一根生满铁锈的锥子在我心脏上戳了一个眼,一股股冰冷的液体留到我的胸腔中潴存起来”^{[19]172}。最能展现莫言感觉化描写的作品,应当是《透明的红萝卜》,从黑孩的视角出发,大量神奇的感官体验扑面而来,充斥在我们的心头,“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美丽的图画:……泛着青蓝幽光的铁砧子上,有一个金色的红萝卜。红萝卜的……尾巴上的根根须须像金色的羊毛”^{[12]29},黑孩对于“红萝卜”和“黄麻地”的奇遇,这些感觉化叙述“极富有乡土生活气息,又充满了朦胧的性暗示”^[20],与黑孩的懵懂、矛盾的情感联系起来,进而展现出隐藏在悲剧之下的诗性,更加使得整部作品向崇高的意义升华。

批评家的评论经常会提到莫言的小说有着卡夫卡的风格、马尔克斯的魔幻以及福克纳般的结构,莫言的小说也确实深受这几位作家的影响。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在莫言作品中表现极为明显,同时莫言也曾多次提到马尔克斯对他创作产生的巨大影响。例如《酒国》,马尔克斯的魔幻手法以及福克纳的意识流手法都有或明或暗的体现,他借助现代手法,不断地与本土的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相融合,进而使得小说作品在狂欢、残暴、血腥、怪诞中升华出一种形而上意义的诗性。莫言不停借助意象的联想与叠加、色彩的变幻莫测、语言的狂欢来进行建构,展现其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的狂放的生命

力,使得乡野、人物、生死的书写别具一格,充满了生命的野性和浓郁的诗性。

三、莫言在当代诗化小说中的独特性

周作人的“抒情诗的小说”概念的提出,预示着中国现代小说一种新的类型的诞生,“诗化小说”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支,从鲁迅、废名、沈从文到孙犁、汪曾祺、贾平凹这几人充分形成了诗化小说的发展脉络。现代诗化小说的发展源头可以推到鲁迅,不仅仅因为他的小说的“象征表现和意象方式”^[6],更重要的在于他的一部分第一人称的小说,充分展现出了鲁迅的主观情绪,带有鲜明的抒情意味。废名刻意采用的诗意的语言,追求诗意淡泊的人生体验,显露出早期诗化小说的特征,具有“含蓄的古典趣味”,废名对于诗境的营造,以及后期对于意境的追寻,都为诗化小说奠定了基础。进一步探索的是沈从文,他继承了废名对于小说意境的营造,《边城》中牧歌的情调,诗意的语言,以及诗意世界当中蕴含自己期许的特点都是与废名一脉相承的。当代承续诗化小说这一脉络的是孙犁,他极力淡化时代的残酷背景,选取了极为淡泊的意象,用诗意的语言来展现人性的真善美,战争、革命在孙犁的小说中都成为展现淳朴人性的背景,他更加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而非是故事情节地开展,在行文结构上近于散文,却又比散文多了份期许和承载,但又不耽溺于感伤,更多的是表达对于真善美人性的追求和和平安定生活的期许,他那“纤细的笔触和细腻的情调”都成为那个革命战争时代的“另一种记忆”。汪曾祺师从沈从文,他强调“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甚至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21]19}。汪曾祺不仅继承了沈从文诗意牧歌的创作风格和企图表现人生的理想追求,更重要的是借鉴了“纯小说”的概念,使得诗化小说不像小说。《受戒》中的景色描写看似漫不经心,却成为故事发展和人物塑造的推手,他追求顺乎自然,在顺乎自然的景色描写中,蕴含着汪曾祺深厚的人文情怀。贾平凹继承了沈从文和汪曾祺的衣钵,继续探索诗化小说,首先表现在他的作品

中所描写的主人公那种“诗意的栖息”^[22],同时表现在作品对意象创作的追求,在这诗意的表现中,更有作家那悲天悯人的诗性关怀。如贾平凹的《山本》,他将写实与抒情结合得不留痕迹,在中国古典诗歌的熏陶和山水画的浸染下,贾平凹对于意象的选取和诗歌的加入,都在增强小说的诗性和抒情性。与此同时,《山本》对于人物的塑造也非常注重其内在蕴含的诗意气质,如陆菊人,“其温煦柔婉气质,以胭脂地、茶行作衬托”^[23],人物与环境相互印证,从而凸显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超脱气质和诗性意味。

梳理完当代诗化小说的发展脉络后,就莫言的诗性叙事是否可以被放置于这一脉流当中,需要来考察莫言诗性叙事的独特性。

1. 抒情性与叙事性并置

莫言的诗性叙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抒情性与叙事性并置。诗化小说结合了散文的特征和小说的文体结构,小说的抒情性是其最明显的特点,而削弱了小说的叙事性,故事情节成为小说人物形象情感抒发的载体。当代诗化小说大多弱化了故事的情节发展,或者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人物情感的发展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展开,在意境的营造和情感的抒发当中寄托自己对于观念世界的期许,由此以来,使得诗化小说的语言表现力和讲述力大大削弱,再现力逐渐增强,诗化小说更加强调的是给读者所带来的美感享受。正如孙犁的质朴简明,汪曾祺的“平白如话”,贾平凹的古典自然,言语的表现力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展现,语言不再成为情节发展的载体,而成为人物形象塑造、作者情感呈现以及诗意美学呈现的载体。但是诗化小说不是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中心,而是通过诗意的语言将人物形象融进意境当中,使得人物形象与诗意融为一体,进而使得人物性格通过诗意语言和抒情氛围隐晦地传达出来。在诗化小说当中,情节的断裂或缺失是为了更好地呈现抒情性,因此,抒情小说更近于散文化。莫言的作品则是强调小说抒情性和叙事性的并置,并没有弱化小说情节,具有鲜明的故事性。前文已经分析到,莫言的诗性叙事主要是依靠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意境的营造、古典叙事的借鉴以及现代手法的运用来呈现的,因此,他在小说当中的诗性叙事往往是与情节的发展需要相辅相

成的,注重情节发展链条中,人物形象呈现的诗意,注重意境营造诗性,但是并不是为了主体情感的抒发,而是更强调整个小说发展的需要以及整体性的呈现。莫言在诗性叙事的同时,始终保持着小说叙事的节奏感和紧凑感,没有使情节断裂,从而使小说在给读者带来阅读享受的同时带来了审美感受。莫言的这种抒情性与叙事性并置,使得小说故事性更强,但是又不失审美性,是对当代诗化小说的完善和发展。

2. 民间性和崇高性相结合

当代诗化小说,极力远离高堂而转向了主观世界的理想追求,如沈从文极力想要建造的“希腊小庙”,孙犁想要追寻的充满真善美的农村,汪曾祺想要回到的诗意水乡,贾平凹想要追求的传统世界。当代诗化小说,都在极力地向乡村靠拢,社会发展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提高,更加摧毁了人性的真善美。这些作者选择了去乡村寻找人类的净土,在对乡村进行描写中,作家更加注重语言的诗意自然、意境的典雅清新、人物的普通单纯,更加注重小说的民间性。莫言小说的“在地性”是非常突出的,因为他充分地利用了民间资源,融合了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和野史传说,加之高密东北乡这一典型地域的朴实风貌,使得民间性非常突出。但是莫言还结合了崇高性,这主要体现在与高堂的结合,莫言不再刻意回避现实,而是逼近现实,如急就篇《天堂蒜薹之歌》,正是取材于1987年发生的“蒜薹事件”,莫言在新版后记中也提到了即使艰难,也要承担起“人民群众代言人”的重担。再如《酒国》,“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24],莫言直接将笔端深入到了社会的幽暗之处,以及其奇异的视角和怪诞的笔法,逼近了腐败的官僚体制。莫言不是逃避世俗,去寻找那片壮丽的高粱地,而是逼近现实,去寻找中华民族的根。莫言努力追求那份责任感和历史担当,而不是使文学仅仅成为作者内心情感宣泄的工具,而是成为某种寄托,体现出莫言身上所具有的责任感,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才使得莫言的作品以民间生活为载体,体现出了某种崇高的意味。

3. 中国古典美学意识与现代批判意识的结合

当代诗化小说与中国古典美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对鲁迅作品进行分类的过程中,王瑶先生建

立了诗化小说与古典诗歌传统之间的联系,使得后继者在创作诗化小说时,都带有中国古典的意味。如汪曾祺充满“文人气”的诗意描写,带有明显的中国古典美学意识;贾平凹的《废都》《秦腔》《山本》等作品,处处都流露出了贾平凹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的衣钵,如《废都》中的西京四大名人,都是浸染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受过中国古典美学熏陶的文人。因此,当代诗化小说中明显的特征就是继承了中国古典美学意识,然而莫言却做到了中国古典美学意识和现代批判意识的结合。莫言在对中华民族那段苦难史进行描写的过程中,通过诗意的笔触,使得这段苦难史不仅具备了古典的美学意识,还饱含着现代批判意识。《生死疲劳》是以畜生的视角来展现中国几十年的荒诞历史,在戏谑当中展现几十年人民的苦难生活。《檀香刑》这部作品,本身讲述的就是中国传统历史上一种酷刑,杂糅的茂腔和韵文,这种韵文的或悲愤慷慨,或柔情缠绵,或戏谑调侃,给人缠绵多情的诗意体验,同时采用荒诞不经和调侃戏谑的口吻为我们诉说这段历史,从而颠覆了这段现代历史叙事。《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饱含了“大地之母”的神圣性,同时通过上官金童的畸形视角,展现出时代的荒诞性以及写实性,从而使得诗意性和现代批判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莫言的诗化小说,继承并发展了当代诗化小说,使得这一文体的艺术空间更加开阔,不仅局限在抒情性和诗性的叙述,更加有反映时代特点的崇高性。抒情性和叙事性结合在一起,世俗与崇高并存,从而使得小说具有了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意识,表达了莫言对于诗性的重新定义,以及对于当代诗化小说的丰富和发展。

四、结 语

通过使用“现代诗性”的含义,即在兼具外在诗化特征与内在精神品质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某种精神追求和生命探寻,来考察莫言的诗性叙事。莫言小说的诗性叙事主要彰显在人物塑造、意境营造、古典叙事、现代手法这几个方面。莫言笔下的人物以坚韧的生命意志、深沉的生命情怀,迸发出动态诗性和崇高诗意。在意境的营造上,莫言将诗性品格注入其中,使得丑恶龌龊的现实,苦难暴力的场景在审美关照下淡化了黑暗的底色,绽放出了绚烂

的诗性之花。并且,莫言兼具中西方叙事特色,中国传统古典的技巧与西方现代叙事方式相融合,不仅符合现代阅读,还弥漫着浓郁的诗意。莫言运用多种现代手法,将诸种美学元素交织其中,使小说作品在狂欢、残暴、血腥、怪诞中升华出一种形而上意义的诗性,从而完成了对人的生命和精神的内在深度的追寻。

莫言滑稽谐谑的语言、离奇荒诞的情节、奇诡多变的手法、污秽的现实描写,看似是在对诗性进行解构和消解,实际上却融汇了中国古典美学和现代主义手法,历史与现实、抒情与叙事等相对并存,从而具备了审美、叙事等多种功能,在荒诞的表象背后的隐喻世界,使得诗性更为突出,形成了一种崇高与荒诞间或混杂的独特的诗性品格。莫言的诗化小说赓续了中国现当代诗化小说的脉络,并在此基础上发展,抒情性与叙事性并置,民间性和崇高性结合,中国古典美学意识与现代批判意识结合,从而为当代诗化小说开拓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丰富和重构了诗性的内涵。

参 考 文 献

- [1] 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 [2] 张文东. “诗性”的文学与批评的“诗性”[J]. 当代文坛,2011(3):4-8.
- [3] 海德格尔. 诗·语言·思[M]. 彭富春,译.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
- [4] 王兵兵. 论海德格尔的“真”与“美”[J]. 当代外国文学,1994(3):160-166.
- [5] 陈建晖. 论散文的诗性智慧[J]. 文艺评论,2006(2):36-41.
- [6] 吴晓东. 现代“诗化小说”探索[J]. 文学评论,1997(1):118-127.
- [7] 席建彬. 20世纪80年代以来“现代抒情小说”研究综述[J]. 德州学院学报,2006(1):27-32.
- [8] 张志忠. “高粱”为什么这样红——《红高粱》的叙事艺术[J]. 名作欣赏,2018(11):58-64.
- [9] 张清华. 叙述的极限——论莫言[J]. 当代作家评论,2003(2):59-74.
- [10] 李凤兰. 莫言小说的女性建构——《丰乳肥臀》读解[J]. 名作欣赏,2009(1):80-82.
- [11] 杨杨. 莫言作品解读[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2012.

- [12] 莫言. 透明的红萝卜[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 [13] 莫言. 红高粱家族[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 [14] 莫言. 檀香刑[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 [15] 莫言. 天堂蒜薹之歌[M].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
- [16] 王金胜,张爱玲. 新体小说:莫言的“诗”性叙事[J]. 东方论坛,2019(2):15-27.
- [17] 洪子诚. 中国当代文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18] 莫言. 我怎样成了小说家[EB/OL]. [2012-10-12]. <http://open.163.com/newview>.
- [19] 莫言. 酒国[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4.
- [20] 郑鹏飞. 莫言小说的感觉化叙述现象研究[J]. 山花, 2013(12):137-138.
- [21] 汪曾祺. 汪曾祺全集[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 [22] 杨荣华. 试论贾平凹小说中的诗性特征[J]. 山东文学,2010(8):72-73.
- [23] 吴义勤,王金胜. 抒情话语的再造——《山本》论之二[J]. 文艺争鸣,2018(6):116-124.
- [24] 张旭东. “魔幻现实主义”的政治文化语境构造——莫言《酒国》中的语言游戏、自然史与社会寓言[J]. 人民论坛,2012(14):66-82.

The Poetic Narrative of Mo Yan's Novels and Contemporary Poetic Novels

HAO Li-ji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definition of “poetic feature” is different in ancient and modern academic circles home and abroad. Derived from poetic category, the concept of “modern poetic feature” can be used to explore the poetic narrative of Mo Yan's novels. His novels demonstrate fully the connotation of “modern poetic feature” in the aspects of characterization, artistic conception creation, classical narrative, modern techniques and so on. Poetic novels are an important spectrum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Mo Yan's poetic novels continue the notion of the poetic novel and develop it on this basis. The combination of lyricism with narrative, folk nature with superiority, Chinese classical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with modern critical consciousness forms a unique poetic character mixing sublime and absurdism. By studying the relation of the poetic narrative of Mo Yan's novels and the contemporary poetic novels, the paper finds that Mo Yan's novels enrich and reconstruct the connotation of “poetic feature” with the complicated and chaotic poetics and open up a broader spa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poetic novels.

Key words: poetic feature; Mo Yan; poetic novels; characterization; creation of artistic concept; classical narrative; modernistic techniques

【编辑 王思齐】